

「打工人」身份對階級話語的取代

繆濤 1155124370

緒論

2020年10月中下旬開始，「打工人」突然成為簡體中文互聯網上的新晉熱詞，「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的口號也迅速風靡。它起初帶有些許無奈自嘲的色彩，隨著傳播與變異，又變成了一劑新的勵志雞湯。

這個稱謂起源自網紅「抽象帶籃子」。他出生自1996年，大專畢業，做過保安，通過網絡主播平台和視頻網站走紅。他的視頻大多以黑色幽默的方式來重新構築自己大專生、保安、乃至打工人的身份認同，例如廣受模仿的「大專人，大專魂，大專都是人上人」，以及「以後985、211都是給咱們打工的」。

因此，不難看出「打工人」這一稱謂起初是形容「抽象帶籃子」這一類起早貪黑卻拿著微薄工資的「低端」勞動者。但隨著這一稱謂及其口號的迅速風靡，它被稀釋為對所有體力勞動或技術勞動者的統稱。如今，無論是工地工人，還是「996」的白領，亦或是中層領導，創業者，都可以自稱「打工人」，也都可以用「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今天搬磚不狠，明天地位不穩」等口號來自勉或自嘲。由此我們看出，「打工人」話語經由廣泛採納，已不可能再是個人或是某一小群體的宣言，而是一種社會行動。同時，通過遵守其使用方式及規約，比如黑色幽默、自嘲口吻，以及順口溜形式等，人們也成功地在「打工人」稱謂中找到了身份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話語本質上體現的是權力關係和意識形態，處於不同社會關係中的話語使用者，對同一社會現實所採取的語言策略也是不同的¹。在「打工人」案例中，流水線農民工與辦公室裡白領所處環境是截然不同的，即使都靠出賣勞動力換取生活資料，前者的報酬也許能勉強維持勞動力本身再生產，而後者的薪水卻能維持城市消費與文娛生活。但弔詭的是，儘管所處環境和社會地位都有著根本性差別，他們卻使用同一套「打工語錄」，也都認同自己的「打工人」身份。這種身份認同傾向與後現代語境下資本主義新形式脫不開關係。非中心化的技術領域、伴隨消費主義出現的各式商品符號、文化

¹ 田海龍。《話語功能性与当代中国新话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 6 (2012): 8-11.

工業的大發展等物質環境促成了傳統的以「階級」為核心的政治領域向各式各樣的「身份認同政治」轉化²。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基於共同身份的政治會遮蔽身份之下不同群體的階級環境及其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從而將一系列社會矛盾轉移向種族、性別、社群等。而在「打工人」案例中，農民工、白領、基層領導等都使用同一套「打工」話語，這一現象使得生產關係中的不平等實質（職工需靠出賣勞動換取生活資料）看似作為社會常識被釐清了，實則模糊了階級的差異，也有礙階級意識的發展。

文獻綜述

階級意識的概念與理論

E.P. Thompson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闡明了階級產生的機制：「當一群人從共同經歷中得出結論，明確了他們之間共同利益以及該利益與其他群體利益的差異甚至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階級形成的要素不單是客觀的物質條件（共同利益），還包括了對該利益的充分認知，及階級意識³。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階級意識是推動「自在階級」（class-in-itself）向「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發展的動力⁴。「自在階級」的工人尚未意識到自己與資本家的根本性對立關係，其鬥爭訴求僅停留在經濟層面。只有當工人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共同處境和利益，確立了自己作為歸屬的階級之一員的角色感，即產生階級意識，才能在階級意識的驅動下進行集體抗爭，從而完成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

需要注意的是，階級意識完全超越了階級群體中的個人觀念，因此它絕不是個人思想的集合，而是屬於群體的意識。由此，C. Wright Mills 從三個方面界定了階級意識：一、對本階級利益的理性認知；二、對其他階級不合理利益的有意識反對；三、對運用集體政治手段達到集體政治目的以實現階級利益的準備⁵。

但正如 Erik Olin Wright 指出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表述傾向於哲學和方法論議題，卻對經驗問題和可操作性缺乏關注。Wright 認為「階級」作為一個超越了個體的實體，並不是具有頭腦並能夠權衡選擇的實體種類，因而它並不具備字面意義上的「意

² 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悖論：多樣性還是單一性》。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0)。2003。

³ Sewell Jr, William H. "How classes are mad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P 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6.

⁴ Marx, Karl.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CH Kerr, 1920.

⁵ Mills, C. Wright.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2002.

識」⁶。所以，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愈發致力於探討階級意識在經驗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其中較易操作的是 Michael Mann 對階級意識的定義。除卻前述的無產階級認同、對資產階級的敵對、階級的整體性之外，Michael Mann 還提出了對另一種社會制度的追求：階級通過對其敵對者對鬥爭，追求另外一種可能的制度⁷。

中國階級話語的消逝

在中國，階級話語在很大程度上由國家主導。1978 年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式的革命理想領導著「階級鬥爭」的浪潮。早在 1925 年，其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明確提到過，進行中國社會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區分「誰是我們（共產主義）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根據這一目的，中國社會被分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等反革命派，半無產和無產階級等革命派，以及中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等有待分化的中間派⁸，而這一分析框架也被沿用到解放後。

隨著改革開放，階級話語被迅速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性話語。2002 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其演變》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⁹，Max Weber 的「階層」理論從而替代了原先 Marx 的「階級」理論。Marx 認為現代社會的結構是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利益衝突的動態過程，而衝突的最終結果是無產階級的統治取代資產階級的統治。但對於 Max Weber 而言，財富、權力、聲望等因素是社會分層的標準，階級只是社會分層的一個現象，而階級結構不過是社會不平等的產物，非以生產方式決定¹⁰。

有關社會分層的討論取代了階級話語，也導致了當今中國社會無可避免的去政治化過程。這不單是對快速變遷的中國社會中已產生的各種矛盾關係的否定，也是對「階級鬥爭」的否定¹¹。社會的關注焦點從生產關係領域移步至公民社會和消費領域，尤其是中產消費。它將一系列社會矛盾歸因於社會不平等、財富不均等市場經濟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問題，從而掩藏起了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

⁶ Wright, Erik Olin. "Rethinking,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in Hall John (ed.). *Reworking Cla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⁷ Mann, Michael.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97.

⁸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党的文献 1(1989):40-45。

⁹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¹⁰ 仇立平。《社会阶层理论:马克思和韦伯》。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1997):99-104。

¹¹ 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开放时代 5，no. 5 (2008): 3-60。

「打工人」稱謂對階級話語的取代

從構詞來看，「打工人」的概念似乎和傳統的「工人」無甚差別，甚至加上一個「打」字（意指從事）能夠更直白地指出其背後的生產關係：工人不佔有生產資料，只靠出賣勞動力換取報酬。因此有些觀點認為「打工人」流行語的火熱體現了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¹²。但事實上，這一現象恰恰表明了中產階級正在對真正「工人」身份進行話語侵佔。本文將從「打工人」稱謂對階級概念以及階級意識的模糊來論證這一身份認同是如何取代階級話語的，並探究這一現象會導致的問題。

「打工人」對階級概念的模糊

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是社會生產關係和制度變革的產物。一方面，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廣大農民投入到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去，成為「中國製造」背後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農民的遷移看似自發，實則離不開政府的主導：新自由主義思潮之下，市場須從國家控制中解脫出來，於是，改革率先從農村開始，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進發，形成中國的第一代農民工。由此，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才得以在中國形成。

不難看出，中國工人階級的組成勢力是廣大農民工，「打工人」本應指代的也是這一群體。但隨著這一稱謂的風靡與廣泛應用，其中農民工佔比已趨近寥寥。而那些在簡體中文互聯網上大量使用「打工人」稱謂及口號的白領、幾層領導等群體，並不會遭遇類似於農民工的階級性困境，反而會使得這些困境被隱藏。

這些階級性困境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他們介於農民與工人之間的過渡身份。農民工在城市的居留在制度上受到戶籍體制的限制，在經濟上受到階級的約束。低微的收入使得他們僅能完成自身勞動力的再生產，很難在城市中安家糊口¹³；而政府雖鼓勵他們來到城市工作，卻缺少完善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各式保障來使他們留下。因此，農民工一直缺乏一個穩定的工作或居留地，他們在工廠與工廠間、城市與城市間、乃至城市與農村間不停流轉，是真正的「流浪人物」¹⁴。而隨著改革開放，一些二代或三代農民工¹⁵本就在城市中出生，相較於父輩，他們對於農村的農耕生活更是缺乏經驗與情感歸屬，寧可選擇在

¹² 溫小雅。《中國：從「打工人」流行語的爆火看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中國勞工論壇：2021。

¹³ Solinger, Dorothy J.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4.3 (1999): 455-478.

¹⁴ 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社会 34.4 (2014):1-24。

¹⁵ 一代農民工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生，七八十年代最早隨改革開放進城務工的農民，二代和三代農民工分別生於七八十年代及八九十年代。

城市中勉強維生也不願回到農村，比如「三和大神」這一類群體。這些現象都使得農民工游離狀態進一步加重，而這些結構性困境都是自稱「打工人」的白領等市民無法理解的。

因此，一個籠統的「打工人」概念將無法區分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與「上班族」，也使得他們各自不同的問題被囊括在同一語境中。在此過程中，「工人階級」這一政治性概念被模糊，一群群「打工妹」「打工仔」在階級生活經驗極其豐富的情況下卻欠缺特屬於他們的話語以進行自我表達。而伴隨著「打工人」身份的風靡，他們的工人主體性也被淹沒在中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各式白領乃至中層領導之中。

「打工人」對階級意識的模糊

伴隨著「打工人」稱謂對「工人階級」概念的模糊，階級意識也將被進一步稀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階級意識產生的必要因素包括了對本階級的認同、對資產階級的敵對，和對新制度的準備。而在中產的白領、基層領導等群體身上並不能看到對資產階級的反抗性，但對於新一代的農民工群體，反抗已初見端倪。

通過「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以及「今天搬磚不狠，明天地位不穩」等口號，中產白領表達的依舊是對階級躍遷和維護自身地位的渴望，因為其市民身份及相較農民工而言更為優渥的生存環境使得他們並不能被算作真正的無產者。雖然從生產關係來看，他們都屬於靠出賣勞動力賺取生活資料的「工人」，但階級意識並非由單一的生產關係決定，其中亦涉及到文化和社會制度。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離不開他們在工作環境中體驗到的強烈的不公平感和對管理方的憤恨¹⁶，這是白領「工人」所體會不到的。

與此相比，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已使農民工群體積怨已久。戶籍制度背後的城鄉二元劃分、各種社會保障體制的欠缺、流水線工廠近乎軍事化的管理模式等等，都使得他們站在勞動一線，充分認識到了不平等的癥結，也使得他們相較於城市白領能夠更早認清階級躍遷的不可能性。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和大神」。

「三和大神」是一群源自深圳舊三和人力資源市場的農民工，他們厭惡工廠制度，專做日結零工，經常「提桶跑路」¹⁷，宣揚「幹一天玩三天」，維持著「混吃等死」的生活狀態。他們中大多都在富士康之類流水線工廠工作過，也都表示寧可過著飢寒交迫的日子都不願再進這些「黑廠」¹⁸。

¹⁶ 吳清軍。《市場轉型時期國企工人的群體認同與階級意識》。社會學研究 6 (2008): 58-79。

¹⁷ 指主動性地突然離開工作單位。

¹⁸ 田豐。《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台灣:海豚出版社。2020年。

雖然「三和大神」是少數，但我們應當看到這種瀰散在新一代農民工中的自由主義傾向、短期工傾向，反工廠制傾向，以及「炒老闆魷魚」的傾向正在一步步壯大（汪暉，2014）。這其中或蘊含著一種隱喻：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構築的「多勞多得以實現階級躍遷」之幻象正在逐漸解蔽¹⁹，新一代農民工正在以「不合作」的全新方式反抗這一烏托邦式的論調。這或許也標誌著農民工正在重新構築自己的階級意識，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邁進。雖然未來發展如何仍未可知，但這一趨向必須與白領式的階級意識區別開來，後者尚未認識到生產關係中的根本矛盾，故而也不具備解放性。

總結

「打工人」稱謂及其口號的流行與稀釋使得其不再能代表原先的農民工群體。如今，無論是工地工人，還是「996」的白領，亦或是中層領導及創業者等等都能在這一個稱謂找到身份認同，並以此來自勉或自嘲。這一適用範圍的擴大看似體現了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實則是模糊了階級的概念，也阻礙了階級意識的發展。特屬於中國新工人的階級性問題，例如城鄉差別、社會保障、戶籍制度等等，都在「打工人」稱謂的廣泛使用中掩蓋了；而白領階層、基層領導等等雖自稱「打工人」，卻不具備中國新工人那樣強烈的階級意識和對資產階級的敵對態度。如今孕育在中國新工人中的「不合作」趨勢或將成為工人階級發展的新方向，而這趨勢卻難以在白領及基層領導類的中產群體中得到共鳴。是以，我們需要釐清誰是真正的「工人階級」，在未來重新凸顯新工人的「打工」主體，希望這能為中國工人階級開創一個改變的空間。

¹⁹ 刘建洲。《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基于卡茨尼尔森框架的分析》。人文杂志 1 (2011): 158-166。

參考資料

- Mann, Michael.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97.
- Marx, Karl.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CH Kerr, 1920.
- Mills, C. Wright.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2002.
- Sewell Jr, William H. "How classes are mad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P 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1986).
- Solinger, Dorothy J.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4.3 (1999): 455-478.
- Wright, Erik Olin. "Rethinking,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in Hall John (ed.). *Reworking Cla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潘毅著，任焰譯。《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 刘建洲。《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基于卡茨尼尔森框架的分析》。人文杂志 1 (2011): 158-166。
- 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社会 34.4 (2014):1-24。
-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党的文献 1(1989):40-45。
- 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开放时代 5， no. 5 (2008): 3-60。
- 田豐。《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台灣:海豚出版社。2020 年。
- 田海龙。《话语功能性与当代中国新话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6 (2012): 8-11.
-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 6(2014):49-70。

吳清軍。《市場轉型時期國企工人的群體認同與階級意識》。社會學研究 6 (2008): 58-79。

溫小雅。《中國：從「打工人」流行語的爆火看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中國勞工論壇：2021。

仇立平。《社會階層理論：馬克思和韋伯》。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5(1997):99-104。

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悖論：多樣性還是單一性》。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0)。2003。